



建立规模

企业报告第44号

欧盟的机构规模分布*

M. Nazım Tamkoç

T他的简报研究了欧盟国家的企业规模分布。已有的文献已经确立，低收入国家中小企业的过剩是资源配置不当的证据。为了调查这一现象，本简报分析了欧洲联盟国家及区域在NUTS1和NUTS2层级上，经济中企业前10%的平均规模（以就业人数衡量）和就业份额。结果显示，高收入国家平均企业规模较大，且在顶端的10%企业中的就业集中度高于低收入国家。这些发现适用于NUTS1和NUTS2的区域层级。此外，企业规模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外国所有权的水平和出口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最后，对企业整体规模分布的比较表明，低收入国家中小企业的比例较高，而大企业较少，这证实了资源配置不当文献中的预测。

小公司规模与资源配置不当之间的关系

文献中普遍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异是各国人均收入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Klenow和Rodriguez-Clare，1997；Prescott，1998；Hall和Jones，1999；Caselli，2005；以及Hsieh和Klenow，2010）。TFP差异的一个主要解释是资源配置不当（Hsieh和Klenow，2009；Restuccia和Rogerson，2013）——即在某个国家内，投入并未分配到最有效的用途。因此，本文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量化将资源重新分配到你最佳使用中带来的生产率和产出收益。

近期研究表明，在较富裕的国家中，企业平均规模通常大于欠发达国家（Bento and Restuccia，2017，2020；Poeschke，2018；Tamkoç，2023a）。这一结果表明，在这些经济体中，资源（如劳动力和资本）能够流向规模较大的企业。因此，资源的错误配置意味着在较小企业中的就业和产出集中度更高。

因此，较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平均规模相比于发达国家的企业规模要小。

逻辑问题是，在低收入国家中，是什么因素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扭曲，从而产生规模较小的企业？换句话说，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资源配置不当。驱动这些扭曲的最被研究的政策之一是规模依赖性（或与规模相关）的扭曲（参见Restuccia和Rogerson（2008）；Güner，Ventura，和Xu（2008）；Hsieh和Klenow（2009）；Bartelsman，Haltiwanger，和Scarpetta（2013）；Garicano，Lelarge，和Van Reenen（2014）；García-Santana和Mas（2014）；Fattal-Jaef（2022）；López和Torres（2020）；以及Tamkoç（2024）等，其中许多）。规模依赖性扭曲指的是那些促进小型企业或对大企业征收更高税收或实施更多监管的政策。全世界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在法国，拥有超过50名员工的机构面临更重的政策；在德国和意大利，大企业面临更严格的劳动力市场法规；罗马尼亚对小企业和中型企业的利率提供补贴；在波兰，小型企业被征收更低的税率——仅举几个例子。发达经济体也可能遭受扭曲，

* 联系：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企业分析。联系邮箱：mtamkoc@worldbank.org。致谢：本简报是关于欧盟27国区域差异和增长机会问题系列的一部分。本系列是世行企业分析团队（DECEA）的产品，并得到了欧盟DG REGIO部门的慷慨支持。团队还感谢Norman V. Loayza和Jorge Rodríguez Meza对评论和出版过程的指导。Nancy Morrison提供了出色的编辑协助。目标和免责声明：本系列简报中的发现并不一定代表世界银行集团、其执行董事或他们所代表政府的观点。本系列的所有简报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ttps://www.worldbank.org/en/research/brief/global-indicators-briefs-series>。

阻碍机构的增长 (Hsieh 和 Klenow, 2014)。也就是说, 关于资源配置不当的文献并没有暗示高收入国家不存在规模依赖型政策; 相反, 它表明此类政策可能会扭曲资源配置, 从而导致进一步的增长。关于小型企业相对丰裕的其他潜在解释, 例如金融摩擦 (Midrigan 和 Xu, 2014; Moll, 2014); 非正规性 (Loayza, 1996; Leal, 2014; Ulyssea, 2018; Sarıkaya, Tamkoç, 和 Torres, 2023; Tamkoç, 2023b); 以及时间税 (Tamkoç 和 Ventura, 2023)。作为参考, Hopenhayn (2014) 和 Restuccia 和 Rogerson (2017) 对资源配置不当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文献还指出, 消除经济中的扭曲因素——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的因素——并不会导致所有生产都集中在一个雇佣所有工人的单一机构中达到均衡状态。由于异质的企业规模主要源于生产中的递减回报, 扭曲因素的去除会导致平均规模增大, 而生产仍在各种规模的企业中持续进行。

这份简报探讨了在欧洲联盟 (EU) 的27个国家 (即欧盟27国) 中, 企业规模的分布是否表现出某种模式, 暗示着小型企业过多的情况。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WBES), 这些调查在2018年至2021年之间进行, 包含了关于企业特征、金融、劳动、基础设施以及政府与企业关系等方面的丰富信息, 涉及各国的非采掘、非农业私营部门 (参见本系列报告的第一份简报)。其他数据, 如按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的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按分解地点的就业情况, 则来自欧盟统计局。

首次从数据中得出的理解是, 在人均GDP较高的经济体中, 企业平均规模较大。企业规模被定义为包括所有雇员和管理人员在内的永久性和全日制工人数量。即使控制了企业特征, 如企业年龄、最高管理层的性别和经验、外国所有权水平、出口销售额比例、是否为多企业公司的一部分以及活动领域, 平均企业规模与收入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回归结果表明, 企业年龄、外国所有权、出口水平和是否为多企业公司的一部分与企业规模呈正相关。另一方面, 由女性最高管理层领导的企业往往比由男性最高管理层领导的企业规模小。

从数据中得出的第二个发现是, 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和地区, 前10%的机构 (按就业人数计算) 的就业份额更高。在特定地点, 前10%的机构的就业份额是该地点前10%的机构 (按机构规模计算) 工人数量与该地点所有机构工人总数的比率。总计该地点的工人数量。在更高收入的国家, 如果更大规模的定义更为狭窄, 即前1%的机构或拥有超过250名工人的机构, 那么就业在这类更大规模机构中的集中度是稳健的。

相应地, 从数据中得出的第三个发现是, 高收入国家总体机构规模分布的右尾比低收入国家的右尾更厚。每个国家的机构规模分布的右尾是通过将超过一定数量的工人的机构占比的对数与工人数量的对数回归的回归线的斜率来计算的。总体而言, 所有这些结果都表明, 欧盟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小型机构较多, 而大型机构比该地区富裕经济体更少。

欧盟内部平均企业规模差异

首先, 为了检验整体收入水平与平均企业规模之间的预期关系在欧洲是否成立, 图1的第二部分展示了欧盟各国平均企业规模的对数 (y轴) 与人均GDP的对数 (x轴) 的对应关系。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 实线表示通过对人均GDP的对数对平均规模的对数进行回归得到的线性拟合。此回归是基于每个地点的总就业量进行加权, 因此人口较多的国家的权重更大。回归系数显示在面板的顶部, 其中***表示在1%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面板b和c分别对NUTS1和NUTS2区域重复了相同的操作。¹

的确, 图A表明, 高收入国家的企业规模平均大于低收入国家。实际上, 27个欧盟国家的平均企业规模为30.2名员工。这一平均值包括了相对低收入的国家, 如波兰和希腊, 它们的平均规模分别为13.9名员工和17.9名员工, 以及高收入国家, 如丹麦和卢森堡, 它们的平均规模分别为59.2名员工和43.4名员工。企业平均规模与

图1 高收入欧盟国家和地区的机构规模较大



来源：

作者根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BES）和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自行计算得出。

注意：

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图a），一个NUTS1区域（图b），或一个NUTS2区域（图c）。在每个面板中，y轴是平均企业规模（按工人数量计算），x轴是欧盟27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两个轴都是对数尺度。面板中的实线是回归线，其中平均企业规模的对数与人均GDP的对数进行回归。回归线的斜率表示为coef。EU27 = 欧盟27国（欧盟）；NUTS = 统计用地区单位名称；PPS = 购买力平价。

a. NUTS1 指的是人口在300万到700万之间的次国家地区。NUTS2 指的是人口大约在80万到300万之间的次国家地区。*** $p < 0.01$

人均GDP为正值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回归系数的大小表明，人均GDP大致翻倍与平均企业规模增加79.7%相关，平均而言。人均规模与人均GDP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证实了宏观发展模型的预测。

同样，图面板b显示，平均企业规模与人均GDP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NUTS1层级上同样成立。NUTS1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存在显著的差异。

在各国之间，就平均企业规模和人均GDP而言。例如，就平均企业规模而言，最高的和最低的NUTS1区域都在法国：在法国北部-加来海峡大区（FRE）平均每个企业有104.1名工人，而科西嘉（FRM）的平均规模是12.3名工人。前者位于英吉利海峡边，与比利时接壤，拥有主要的汽车工业，而后者区域以其旅游业活动而闻名。在整个欧盟的90个NUTS1区域中，平均员工人数为27.8人。分布的右尾似乎是这样的。

德国由NUTS1区域主导。这里有29个NUTS1区域，其平均企业规模高于欧盟NUTS1平均水平，其中超过三分之一（11个）位于德国。尽管NUTS1区域之间差异较大，但企业规模与人均GDP回归中的显著系数表明，人均GDP每增长10%，平均而言，企业平均规模将增长约3.7%。图c对186个NUTS2区域重复了同样的分析。

欧盟各区域。随着区域进一步细化，回归线的斜率降低，但仍为正值且具有统计学意义。所有NUT2区域平均规模为28.1个工人。其中，平均企业规模超过总体平均水平（71）的NUTS2区域中，有16.9%位于德国，8.5%位于荷兰。丹麦的Hovedstaden地区（首都地区）和法国的Nord-Pas-de-Calais地区（之前讨论的FRE NUTS1区域内），在欧盟中平均规模最高，而波兰的Zachodniopomorskie和Podkarpackie NUTS2区域平均企业规模最小。平均企业规模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在更细化的样本中减弱。顺便提一下，在最细化的级别（即NUTS 2区域）上，平均企业规模的变化最大。在国家级别，平均规模的均方差为9.4个工人，而在最细分级别上为13.9。

在NUTS1层级为14.6，在NUTS2层级为14.6。图2显示，平均企业规模与人均GDP之间的正向关系并非主要由地区产业结构所驱动。制造业占比定义为在地区中从事制造业的企业百分比。面板a展示了企业平均规模与制造业占比之间的关系，而面板b展示了在NUTS1级别上，制造业占比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在10%的水平上，两个回归斜率均不显著。

建立的企业规模对外资企业和较老的企业来说更大，而在女性担任最高管理层的机构中则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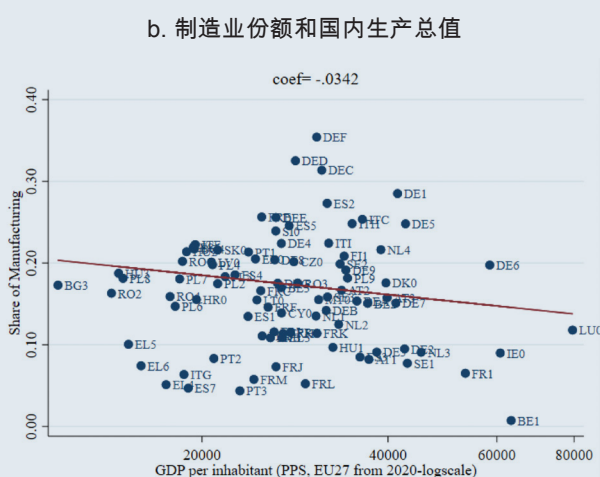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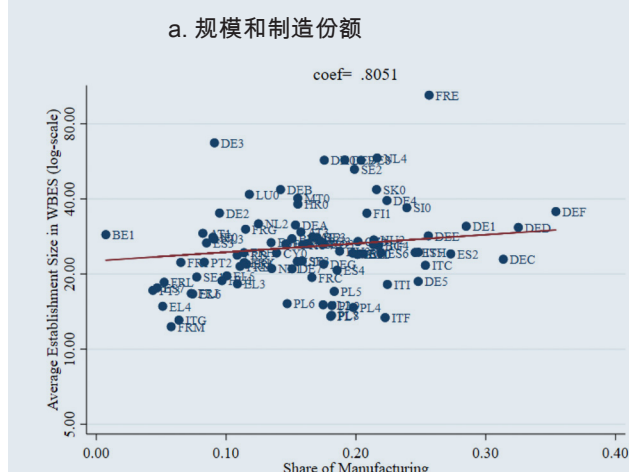
企业规模与开发水平之间的关系如何与企业的特征相关？在本次研究中，考虑了三个重要的企业特征：外国所有权、年龄以及高管的性别。仅展示了NUTS1级别的结果，但国家级和NUTS2级别的结果也具有相似性。

外国所有权可能与更大规模的企业相关，如果外国公司仅认为建立或收购更大规模的企业具有价值，尤其是如果他们必须管理这些企业的运营的话。

图2

地区产业的构成并未推动平均企业规模与人均GDP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制造业在全球统计区域NUTS1中的份额



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BES）和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自行计算得出。

注意：每个点代表一个NUTS1区域，人口从300万到700万不等。在图a中，y轴表示平均企业规模。

在对数尺度上，x轴是制造业中企业的份额。在图b中，y轴是制造业的份额，x轴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欧盟27国中的2020年数据，以对数尺度表示。每个面板中的实线是回归线，其中y轴是根据x轴回归的值。回归线的斜率表示为coef。EU-27 = 欧盟的27个国家；NUTS = 地域单位命名法统计数据；PPS = 购买力平价标准。

图3显示，外国所有权率较高的NUTS1地区通常拥有更大的企业，平均而言。外国所有权定义为私人外国个人、公司或组织拥有的企业百分比。所有NUTS1地区的平均外国所有权为5.4%，而在高收入NUTS1地区，这一比例为8.7%。有九个NUTS1地区的国外所有权低于0.5%：意大利有三个，波兰有五个，葡萄牙有一个。这些地区的平均企业规模为15名员工，占NUTS1平均规模的53%。外国所有权每增加1个百分点，相关企业规模就增加3.5%。

图4显示，NUTS1区域内成立时间较长的机构通常规模更大，平均而言。NUTS1区域内机构的平均年龄为28.1年（相比之下，高收入地区的平均年龄为30.2%）。有14个NUTS1区域的平均年龄低于20年。在这14个NUTS1区域中，平均成立时间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之后的。除了意大利的两个NUTS1区域外，平均年龄低于20岁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此外，五个最古老的NUTS1区域中有四个位于德国，那里的平均成立年龄超过40年。如果女性经理面临更高的扭曲或

图3 地区外国所有权比率较高的地区往往拥有更大的企业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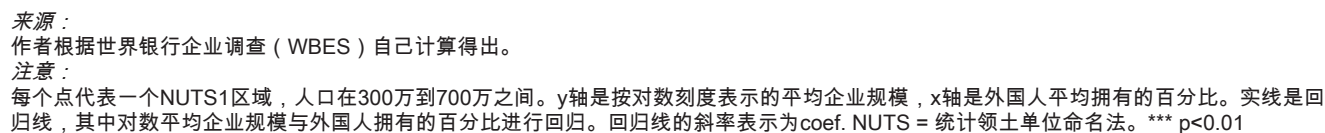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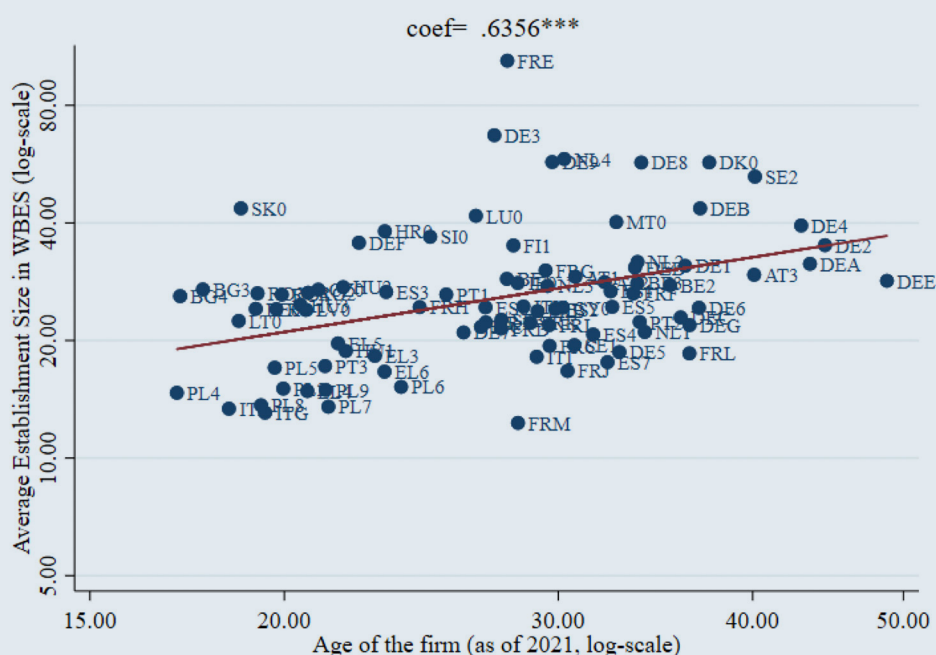


图4

地区中历史悠久的企业往往规模较大。



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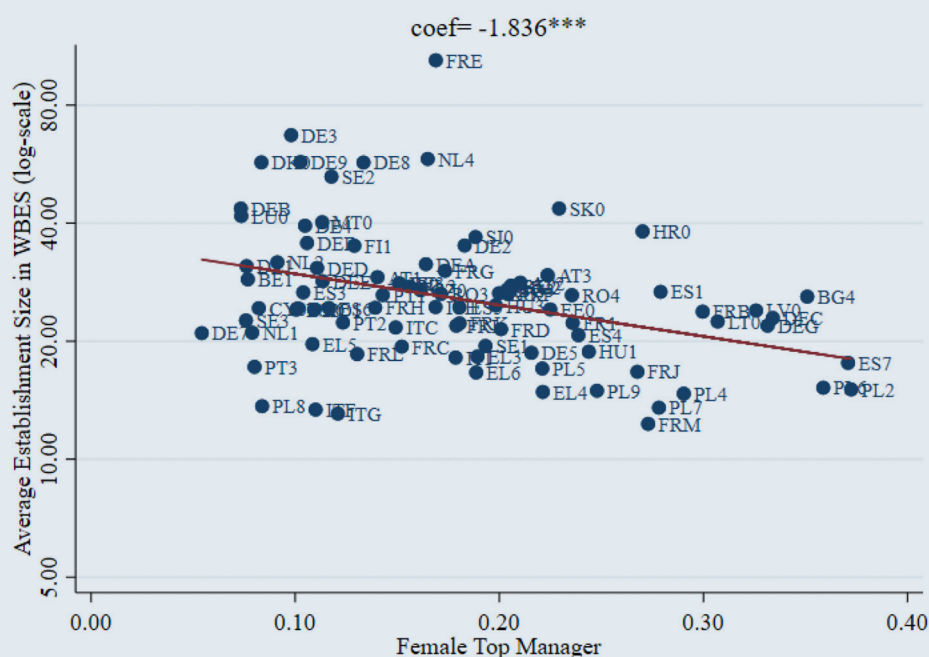
作者根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WBES) 自己计算得出。

注意：

每个点代表一个人口在300万到700万之间的NUTS1区域。y轴是 establishments 的平均规模的对数尺度, x轴是区域内 establishments 的平均年龄。实线是回归线, 其中对数平均 establishments 规模是对数平均区域内 establishments 规模的回归。回归线的斜率表示为 coef. *** p<0.0

图5

区域中女性高层管理人员比例较高的往往拥有规模较小的机构。



来源：

作者根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WBES) 自己计算得出。

注意：

每个点代表一个人口在300万到700万之间的NUTS-1区域。y轴是按对数尺度计算的建立企业的平均规模，x轴是区域中企业的平均年龄。实线是回归线，其中对数平均企业规模与区域中具有女性高层管理者的企业份额进行回归。回归线的斜率表示为coef. *** $p < 0.01$ 。

17.9%。在NUTS1层面上，平均企业规模对女性管理层份额的显著负回归系数表明，女性高级管理人员份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企业规模将减少约1.8%。在NUTS1地区，平均而言，女性高级管理人员占比不到10%的企业拥有32.2名员工，而女性高级管理人员占比超过25%的企业平均雇佣20.7名员工。表1报告了企业层面的结果。

回归分析中，对永久全职员工数量的自然对数值与多个企业特征之间的关系。除了人均GDP（在NUTS1级别）外，回归还包括了领域最高管理人员的经验（以年为单位）、销售额中有多少来自出口以及企业是否为多企业公司的一部分。

结果表明，即使在考虑了所有企业层面的特性之后，发展水平仍然是企业规模的重要决定因素。虽然人均GDP对数值的系数相对于图1中的面板b报告的系数较小，但它仍然为正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控制了企业层面的特性后，关于企业规模与人均GDP弹性的估计值为0.11。此外，即使控制了发展水平（即人均GDP），企业的年龄、出口状态、是多个企业的组成部分以及外国所有权也会显著增加企业的规模。相反，并且与NUTS1层面的分析一致，由女性高级管理人员经营的企业比由男性同行经营的企业小14%。

表 1 发展水平，机构年龄，出口状况，是否属于某个组织
多机构设立，以及外国所有权显著增加规模的建立

依赖变量：对数数量 # 工人	(1)	(2)	(3)	(4)	(5)	(6)	(7)
居民人均GDP日志 (在NUTS1级别)	0.30*** (0.05)	0.28*** (0.05)	0.25*** (0.05)	0.20*** (0.05)	0.20*** (0.05)	0.13** (0.05)	0.11** (0.05)
顶级经验的体验 经理		0.003** (0.002)	-0.003* (0.002)	-0.004** (0.002)	-0.004** (0.002)	-0.005*** (0.002)	-0.005*** (0.002)
年龄日志			0.26*** (0.03)	0.23*** (0.03)	0.23*** (0.03)	0.22*** (0.03)	0.22*** (0.03)
销售占比 来自出口				0.76*** (0.09)	0.75*** (0.09)	0.65*** (0.09)	0.56*** (0.09)
女性高级管理人员					-0.15*** (0.05)	-0.14*** (0.05)	-0.14*** (0.05)
多机构 (dummy)						0.67*** (0.06)	0.65*** (0.06)
所占百分比 外国人							0.43*** (0.09)
持续	-0.75 (0.53)	-0.56 (0.53)	-0.92* (0.53)	-0.38 (0.54)	-0.28 (0.54)	0.36 (0.54)	0.61 (0.54)
行业（虚拟）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观测数量	18841	18513	18427	18315	18303	18303	18175

来源：

作者根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BES）和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自行计算得出。

注意：

胡贝尔-怀特稳健标准误以括号标出。结果基于NUTS1级别，针对人口在300万至700万之间的地区。***p<0.01，**p<0.05，*p<0.1

大中型企业的就业份额

如讨论所述，数据显示各国和地区的企业平均规模差异很大。因此，仅根据员工数量来讨论各地区最大的企业可能会产生误导。例如，法国上法兰西NUTS1地区的规模最大企业位于前10%的企业对应140名员工，而科西嘉NUTS1地区的规模最大企业位于前10%的企业则是30名员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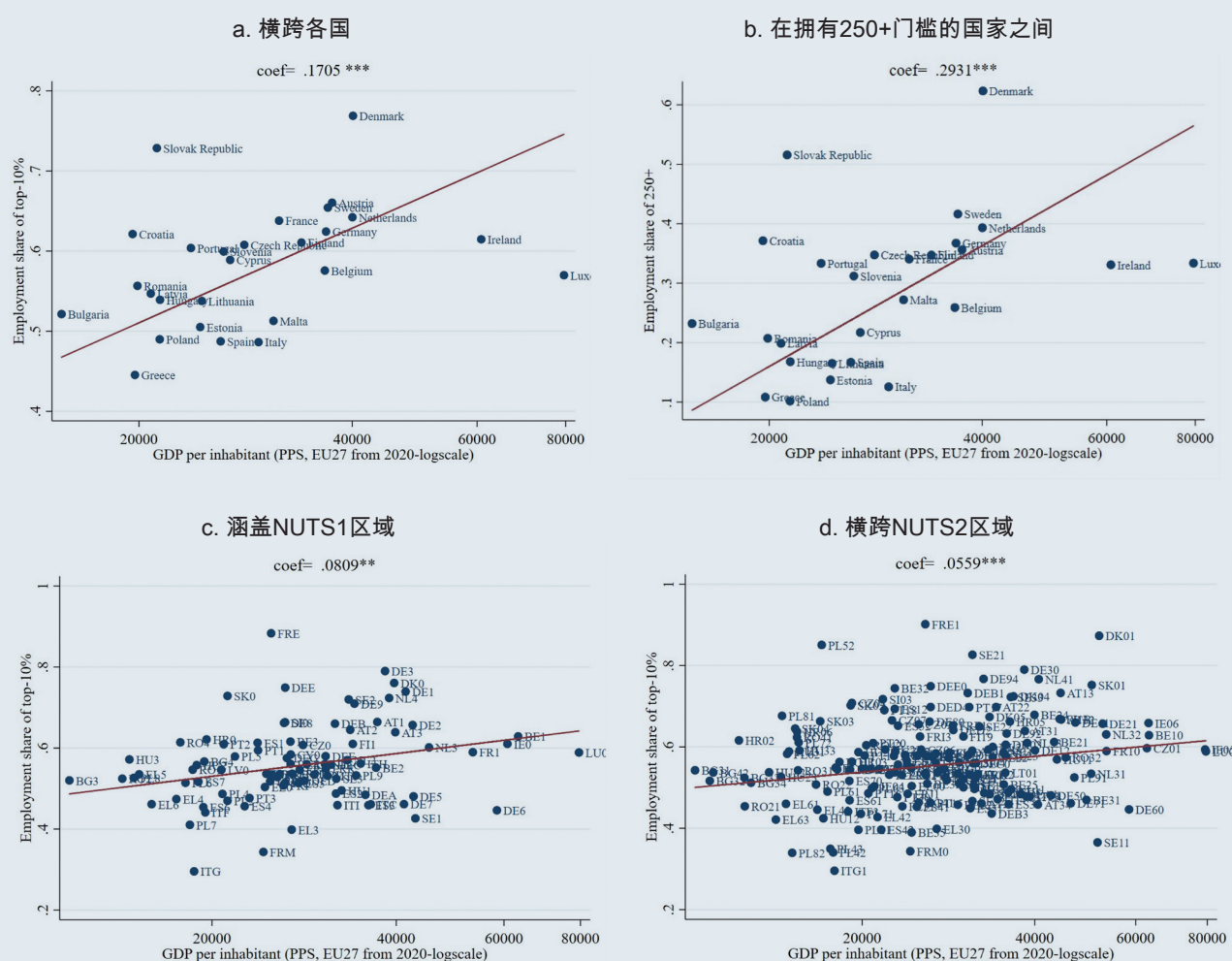
图6显示，在较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顶级10%的企业中，就业份额较大（面板a）。

平均就业份额在欧盟27个国家的前10%的机构中为58.3%。丹麦大机构的就业份额最高，为76.9%，而希腊最低，为44.5%。国家层面上，就业份额与人均GDP的统计显著回归系数表明，人均GDP增长10%，将导致大机构就业份额增长1.7个百分点。

面板B展示了类似模式，即拥有至少250名员工的企业就业份额。面板B中的回归系数大于面板A中的系数，表明较强的...

图6

顶级10%的企业和至少有250名工人的企业的就业份额在更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较大



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BES）和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自行计算得出。

注意：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图面a），NUTS1区域人口范围从300万到700万（图面b），以及一个NUT2区域。

人口从约80万到300万不等（图c）。在每张图中，y轴表示前10%的机构的就业份额，

并且x轴为欧盟27国202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S），两个轴均采用对数刻度。两个面板中的实线为回归线。

在将前10%企业的就业份额对人均GDP的对数进行回归分析后，回归线的斜率表示为 coef 。EU-27 = 欧盟27个国家；NUTS = 统计单位领土名称；PPS = 购买力平价

标准。

*** $p < 0.01$

建立至少拥有250名员工的企业就业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这种较强的关系似乎主要是由相对低收入国家中非常低的就业份额所驱动。例如，在丹麦，顶尖10%的企业和至少拥有250名员工的企业就业份额分别为76.9%和62.3%。相比之下，在罗马尼亚，顶尖10%的企业和至少拥有250名员工的企业就业份额分别为55.7%和20.7%。本简报的其余部分专注于顶尖10%的企业的就业份额，因为存在没有250名或以上员工的企业NUTS1和NUTS2地区。

面板C展示了大型企业就业份额与NUTS1级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所有NUTS1区域内，前10%企业的平均就业份额为55.9%。FRE (Freedom Region) 拥有最高的就业份额：该地区的大型企业雇用了近88%的所有工人，与前一节中呈现的均值企业规模非常接近。另一方面，意大利岛屿NUTS1区域 (ITAG) 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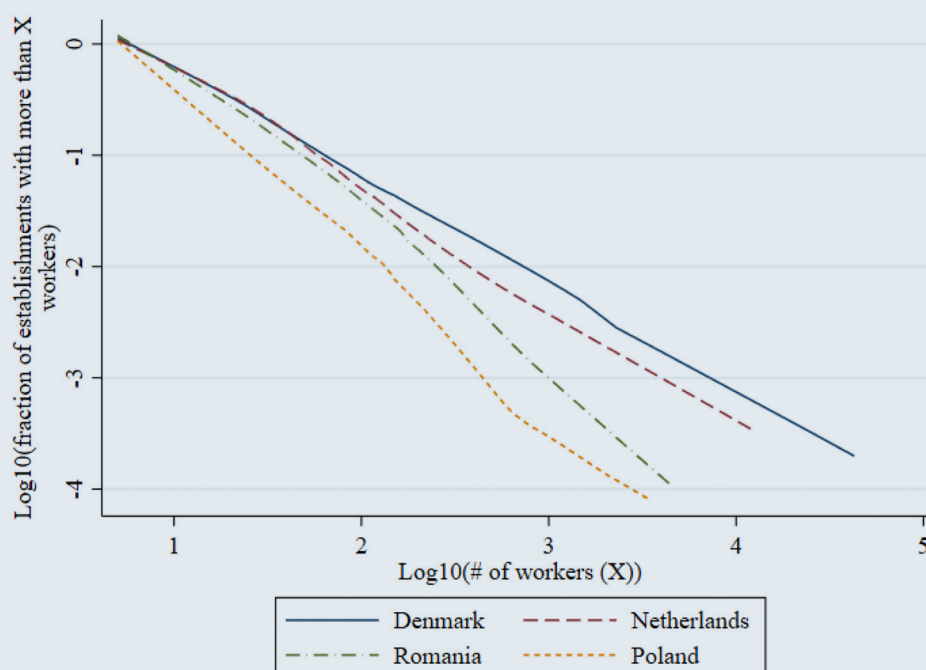
最低的大型企业就业份额，约占30%。

图d展示了NUTS2级别的结果。即使在这点上，高收入地区的就业份额也更高。平均而言，前10%的企业的就业份额为56.4%。一些国家似乎在NUTS2级别的前10%企业的就业份额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在波兰的Opolskie (PL52) 和瑞典的Småland及岛屿 (SE21) NUTS2地区，超过80%的就业集中在前10%的企业中，而在波兰的Podkarpackie (PL82) 地区 (波兰) 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SE11) 地区，大型企业的就业份额约为35%。尽管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NUTS2地区之间就业份额存在很大差异，但回归系数0.06是显著的，这意味着高收入地区的就业在大型企业中的集中度平均更高。

建立规模分布

图7展示了四个选定欧盟国家 (丹麦、) 的对数-对数建立规模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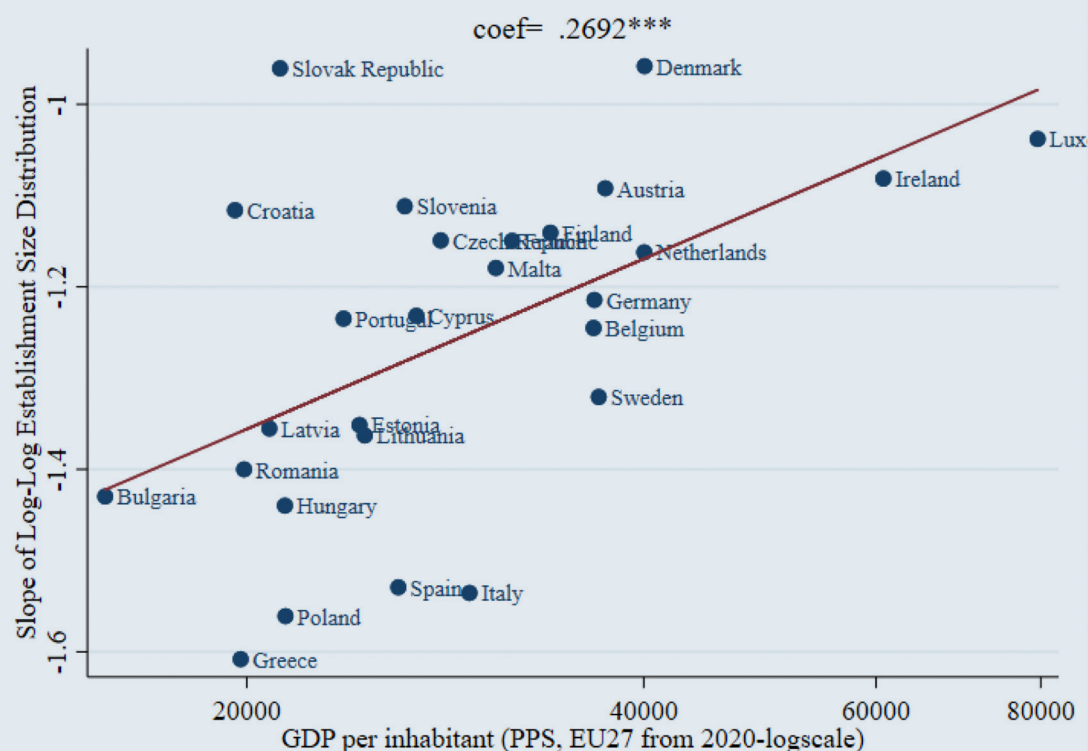
图7 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工厂数量远少于丹麦和荷兰。



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WBES) 自己计算得出。

注：每条线代表一个国家对数-对数企业规模分布线。y轴是企业占比的对数 (以10为底)。在至少X名工人和x轴是工人数量 (X) 的以10为底的对数。所有线均使用局部加权回归进行平滑处理。

图 8 比较欧盟国家之间对数-对数建立规模分布图斜率



来源：

作者根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BES）自己计算得出。

注：

每行代表一个国家。y轴表示回归线的斜率，其中至少有X名工人的企业所占比例的对数（以10为底）与工人数量（X）的对数进行回归。x轴显示人均GDP。实线回归线是通过在各国层面对对数-对数企业规模分布的斜率与人均对数GDP进行回归得到的。Coef表示回归线的斜率。EU 27 = 欧洲联盟（EU）的27个国家；PPS = 购买力平价。*** $p < 0.01$

荷兰、波兰、罗马尼亚）。横轴表示经济体中工人数量的对数（以10为底）。纵轴表示拥有相同数量或更多工人的企业比例的对数（以10为底）。数据仅涵盖拥有超过5名工人的企业。例如，每个经济体中拥有超过5名工人的企业比例为1（或100%），其中10的对数为0。图7中的企业规模分布通过局部加权回归进行平滑处理。由于企业规模分布的对数-对数图在5名工人处具有零值，因此线的斜率表示各国企业规模分布。斜率较大的企业规模分布线（或绝对值较小的斜率）表明存在许多大型企业，而斜率较小的企业规模分布线（或绝对值较大的斜率）则表明小型企业较多。

然而，在丹麦，右侧的尾部比荷兰更厚。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建立规模分布与丹麦和荷兰看起来非常不同。罗马尼亚和波兰拥有许多较小的工厂，例如，这些国家拥有超过100或1000名工人的企业的比例远小于丹麦。

图8显示，在较高收入国家，Log-Log企业规模分布图的斜率更大（或从绝对值上讲更小）。企业规模分布的斜率是通过将各国企业份额的对数（图7的y轴）对数化（图7的x轴）对每个国家进行回归计算得出的。虽然丹麦的企业规模分布斜率为-0.95，但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一比率约为-1.42。上述结果得到了证实，企业规模分布斜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呈正相关，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

丹麦和荷兰拥有少于100名员工的机构比例非常相似。

结论性评述

该研究使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WBES) 的建立级数据，对27个欧盟国家、90个NUTS1地区和186个NUTS2地区的误分配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文献中的发现得到了证实，即误分配导致低收入国家小规模企业的过度繁荣和就业在小规模企业中的集中。

注释

1 NUTS指的是欧盟地理分类系统，即统计用地区单元名称。NUTS1，最大的单元，人口在300万至700万之间。NUTS2指代具有约80万至300万人口的次国家级地区。

参考文献

- Bartelsman, E. J., J. Haltiwanger, and S. Scarpetta. 2013. “跨国生产率差异：配置与选择的作用。”《美国经济评论》103 (1) : 305–34. Bento, P. 和 D. Restuccia. 2017. “配置不当、企业规模与生产力。”《美国经济期刊：宏观经济学》97: 71–87. Bento, P., and D. Restuccia. 2021. “在行业和国家间平均企业规模的探讨。”《货币经济学杂志》117 (C) : 220–42. Caselli, F. 2005. “Accounting for Cross-Country Income Differences.” In 《经济增长手册》第1A卷，由P. Aghion和S. N. Durlauf编辑，第679–741页。Elsevier。
- Chari, A., W. Chen和K. M. E. Dominguez. 2009年。“外国所有权与企业绩效：美国新兴市场收购。”NBER工作论文No. 14786，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马萨诸塞州剑桥。Chiplunkar, G.和P. K. Goldberg. 2023年。“女性创业壁垒的总体影响。”NBER工作论文No. 28486，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马萨诸塞州剑桥。Fattal-Jaef, R. 2022年。“进入壁垒、特殊扭曲和公司规模分布。”《美国经济期刊：宏观经济学》14 (2): 416–68. Francis, D., and F. Jolevski. 2023. “评估欧盟27国的商业环境：概述。”DECIG简报，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García-Santana, M., and M. Mas. 2014. “印度的保留地法律和要素的错配。”《货币经济学杂志》66 (C): 193–209. Garicano, L., C. Lelarge, and J. Van Reenen. 2014. “企业规模扭曲与生产率分布：来自法国的证据。”《美国经济评论》104 (11) : 3557–96. Güner, N., G. Ventura, 和Y. Xu. 2008. “基于规模依赖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货币经济学杂志》55 (6): 1038–51.
- Hall, R. E., and C. I. Jones. 1999.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季度经济学杂志》114 (1): 83–116. Hopenhayn, H. A. 2014. “Firms, Misallocation,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A Review.”《经济学年度评论》2014，第6卷，第1期，第735–70页。Hsieh, C. T. 和 P. J. Klenow. 2009. “中国和印度的资源配置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季度经济学杂志》124 (4) : 1403–48. Hsieh, C. T. 和 P. J. Klenow. 2010. “发展会计。”《美国经济杂志：宏观经济学》2 (1) : 207–23. Hsieh, C. T., P. J. Klenow. 2014. “印度和墨西哥植物的生命周期。”《季度经济学杂志》(3, 8月): 1035–84. Klenow, P. J., 和 A. Rodriguez-Clare. 1997. “增长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复兴：是走得太远了吗？”收入 NBER 宏观经济学年度报告 1997 第12卷，由B. S. Bernanke和J. J. Rotemberg编辑，第73–103页。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Leal, J. C. 2014. “税收征管、非正规部门和生产力。”《经济学动态评论》17 (2) : 262–86. Loayza, N. V. 1996. “非正式部门的经济：一个简单模型和来自拉丁美洲的一些实证证据。”卡内基-罗切斯特公共政策会议系列 45 (十二月) : 129–62. López, J. 和 J. Torres. 2020. “规模依赖政策、人才错配与技能回报。”《经济学动态评论》2014年10月第38期: 59–93页。Midrigan, Virgiliu, 和Daniel Yi Xu. 2014. “从企业层面数据看金融与资源错配：证据。”《美国经济评论》，104 (2): 422–58. Moll, Benjamin. 2014. “从金融摩擦造成的生产率损失：自我融资能否纠正资本错配？”《美国经济评论》，104 (10): 3186–3221. Poeschke, J. 2018. “The Firm Size Distribution across Countries and Skill-Biased Change in Entrepreneurial Technology.”《美国经济期刊：宏观经济学》10 (3) : 1–41. Prescott, E. C. 1998. “Needed: A Theory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国际经济评论》39 (3) : 525–51. Ranasinghe, A. 2024. “企业间性别配置失当。”《比较经济学杂志》52 (第1期，2008年3月) : 183–206. Restuccia, D. 和 R. Rogerson. 2008. “政策扭曲与异质企业的总体生产率。”《经济动态评论》11 (4) : 707–20. Restuccia, D. 和 R. Rogerson. 2013. “Mis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经济学动态评论》16 (1): 1–10. Restuccia, D. 和 R. Rogerson. 2017. “The Causes and Costs of Misallocation.”《经济展望杂志》31 (3): 151–74. Sarıkaya F., M. N. Tamkoç, and J. Torres. 2023. “Informality as a Barrier to Plant Growth.” Working Paper. Tamkoç, M. N. 2024. “Bribery, Plant Size and Size Dependent Distortions.”《发展经济学杂志》，171 Tamkoç, M. N. 2023a. “管理者，人才错配与生产力。”工作论文。Tamkoç, M. N. 2023b. “通过发展消除非正式性。”工作论文。Tamkoç, M. N. 和 G. Ventura. 2023. “规则与法规，管理者时间与经济发展。”工作论文。Ulyssea, G. 2018. “企业、非正式性与发展：来自巴西的理论证据。”《美国经济评论》108 (8): 2015–47.

企业简报系列提供简短的研究报告，以鼓励在商业环境问题上的思想交流。简报展示了政府政策与企业创造财富能力之间的关系。简报带有作者姓名，应相应地引用。本简报中表达的观点、解释和结论完全是作者的观点。它们不代表世界银行/重建与发展银行及其附属机构的观点，也不代表世界银行执行董事或他们所代表政府的观点。